

档案出版社

调研与综合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之六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之六

调研与综合

王鸿江 主 编

档案出版社

1990年

责任编辑：孙东升 高建平

调研与综合

王鸿江 主编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第二印刷分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61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16001—28500册

ISBN7—80019—250-4

G·170定价：3.50元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编委会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方之 王占德 王树盛

王鸿江 宋士忠 张 弩

郑庆福 侯 磊 温 祥

101233/01

致 读 者

近几年来，关于秘书工作的论著现在已经出得不少。那么，为什么还要再编写这么一套《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呢？这套丛书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吗？

我们认为，这套丛书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首先在于它的系列性。这套丛书包括《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概述》、《公文撰稿与审核》、《文件收发与处理》、《文书立卷与归档》、《信息工作》《调研与综合》、《催办检查工作》、《查办工作》、《内部刊物编辑》、《会议组织与服务》、《公务接洽与领导活动安排》、《信访工作》、《秘书人员修养与队伍建设》、《怎样当办公室主任》、《怎样做领导人秘书》等十余册。这样就基本上囊括了秘书工作的各个方面，各册都有特定内容，可以独立成书，合起来又是一套较为完整的系列丛书。

其次在于它的实用性。这套丛书是在档案出版社的倡议下，由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省、市委办公厅等单位，组织从事过多年或目前正在从事秘书工作的一批新老秘书工作者编写的。编写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足于实用。为做到这一点，在编写过程中，各承写单位不仅认真总结了本地区有关秘书工作经验，而且广泛吸收了外省市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了意见，书稿写出后又经反复研讨、审改。

总之，我们力争编写出这样一套丛书：正在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读了以后觉得切合实际，对自己的工作能起规范和提高的工用，准备从事秘书工作或新到秘书工作岗位的同志读了以后感到清楚明白，可作业务入门的向导。

第三在于它的针对性。这套丛书不是说讲一般秘书工作的，而是着重阐述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省、地、县各级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者（当然，对其他各类秘书工作人员也有参考作用）。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使丛书内容符合这样一个读者群的需要。同时，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这几年发展很快，并且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也作了改革的尝试。秘书工作的改革是一新的课题，提出了不少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这一套丛书也力求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以适应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

这样看来，编写这么一套《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还是很必要的。究竟是否如此，那就要请广大读者来评议了。

由于水平所限，且因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本身也还在不断改革和发展，现在的这套丛书肯定很不完善，可能会有不少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秘书界同行批评指正。

《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丛书》编委会

1988年6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调查研究	(3)
第一节 调查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重要性	(3)
第二节 调查研究工作应该坚持的科学态度 ...	(11)
第三节 秘书部门调研工作的特点	(21)
第四节 秘书部门调研工作的种类、层次及题目的选择	(26)
第五节 调查研究的步骤和方法	(38)
第六节 怎样写调查研究报告	(63)
第七节 调查研究成果的应用	(85)
第二章 情况综合	(92)
第一节 情况综合的意义和作用	(92)
第二节 情况综合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98)
第三节 情况综合的几种通用科学方法	(101)
第四节 情况综合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150)
第三章 资料工作	(177)
第一节 资料 and 资料工作	(177)
第二节 秘书部门的资料工作	(184)
第三节 秘书部门资料工作的具体内容	(189)
第四节 秘书工作人员个人使用资料的积累 ...	(222)

引 言

调查研究、情况综合和资料工作，是党政机关秘书部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重要任务。本书之所以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放在一起，是因为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都是属于各级秘书部门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政务性工作。

198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曾经召开一次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那次会议，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各级党政机关秘书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进一步开创秘书工作新局面的问题。会议提出，在新形势下，各级党政机关秘书部门要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必须在发扬优良传统和总结、继承过去的好经验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改进工作。本书就是遵照这一基本精神编写的。

本书针对当前各级党政机关秘书部门新手多，各级各系统秘书部门又各有不同特点和要求，把编写的重点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要求、基本规范和基本方法方面，尤其关于基本方法方面的内容尽量多介绍一些，花的力气大一点。同时，注意联系秘书部门的工作实际，力求针对常见的问题讲话，避免空泛议论。因此在“调查研究”一章里，除对秘书部门调研工作的意义、特点、调研层次以及选题等方面结合实际进行分析、探讨外，对调研的步骤和常用方法做了较多的介绍。此外，把调研成果的应用问题，专门列为一节。这是考虑到，调研工作如何同领导决策紧密结合，使调研成果

一、确实在决策中起到作用，是当前急待通过实践给予回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做些探讨，那怕只是初步的，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还是必要的。“情况综合”一章，方法部分约占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意在普遍适用的几种最基本的分析、综合方法做些系统介绍。同时，结合情况综合工作中常见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如何具体运用这些基本的分析、综合方法，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一些体会。在“资料工作”部分，重点也是放在如何做好资料的收集、加工、管理和服务的具体方式方法方面，并对秘书人员个人积累资料的问题，也做了概要的介绍。总之，力求通过这些介绍，引起老秘书工作者的共鸣与回味，使参加秘书工作不久的新一代从中得到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本书涉及的一些内容，既有编者个人的切身工作实践的体会，也吸收了不少同行有关著作、文章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是集众家研究之所得的一本小册子，目的在于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提高。

本书由王鸿江主编，参加编著的还有赵庆、刘士才、刘建云、李世琨等同志。

第一章 调查研究

第一节 调查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 特殊重要性

调查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的正确途径，是我们搞好一切事业的前提条件。

我们通常把调查、研究放在一起说，其实调查与研究固然有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区别的。调查和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调查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客观世界的各种实际情况或获得各种信息；研究则是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或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调查是研究的前提，而研究是调查的深化和发展。二者虽是认识的不同阶段，却都是统一过程中互相联系、不可缺少的环节。具体点说，通过调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即取得对所调查的事物的各种现象、各个方面以及这一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外部联系的种种感觉材料，经过反复研究、思考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得到对事物的整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并据此制定出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法，用来指导实践。这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调查和研究统一。它体现了认识发展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

辩证统一，也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体现，是人们的认识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主要桥梁，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的继承者，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不仅对此提出过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在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对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对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的状况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并作了深入的实际考察，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对各种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资本论》这部不朽的著作，就是调查研究的结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①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它是我们党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在理论建设和斗争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不断调查研究，逐步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数十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要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的

^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1页。

事业就顺利，就兴旺发达；只要离开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决定问题，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研究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光大，须臾也不能忽视它、离开它。

当前，我国正处在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形成我们自己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经验，并以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加强调查研究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也是我们新时期调研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

^①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

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使整个社会机制缺乏生机和活力。于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开始对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现在苏联也在进行改革。这些国家的改革，有的迈的步子大一点，有的步子小一点，有的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的遇到困难多一些，都在探索中前进。因此，我国正在进行的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虽然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作法和经验，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开拓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地认识中国国情，使之在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从总体上、宏观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且要从微观上研究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项工作的具体规律。以改革为例，不仅要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总体框架，而且对每个环节从构想到具体实施步骤都需进行研究。全面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在各个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探索、试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都要经过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到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局部试点到全面铺开，每一步决策，都是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论证而作出的。可以说改革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籍，大兴调查研究的成果。

二、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后，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活跃就意味着发展变化，过去多年不变的事物，今天可能瞬息万变，以前表现单调的事物，今天就可能复杂起来。比如，过去实行完全计划经济，许多产品都按计划生产、销售、供应，每年安排生产和市场虽然也有变化，但那都是在“预料”之中的。而现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安排生产和安排市场都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必须经常对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根据准确的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至于说到物价变化就更大了，过去几十年间许多商品价格几乎毫无变化，而现在搞商品经济，就要进行物价改革，调整和理顺物价。在这种情况下，光凭老经验办事显然不行了，必须凭借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掌握经常变化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正确对策，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再比如，由长期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冲击，其影响不论是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都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的或者所不熟悉的，是支持还是遏制，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必须在对现实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寻求答案，除此别无他途。在今天，我们进行每一项决策，从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领导拍板，组织实施，直到贯彻情况的反馈，都更需把调查研究贯彻始终。

现在新事多，难事多，许多课题都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毛泽东

对调查研究极端重要性的论述就觉得更为亲切也更为深刻了。他曾经说过：“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①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经精辟地指出了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重要性。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②这都说明，当我们遇到矛盾和困难，不应在冥思苦想中找出路，也不要期望在哪本书中得到具体答案，必须迈开双脚，到实际中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调查研究不仅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决策的基础，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指示是面向全国，在贯彻执行时，如果不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机械地照搬照转、照本宣科，那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而要做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自然就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③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三、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不脱离群众， 不脱离实际

是否坚持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关系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否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有些同志往往把调查研究看得无关紧要，认为不调查研究照样可以搞好工作。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其原因说到底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调查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革命胜利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不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生产上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没有通过调查研究去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实际所造成的。因此，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左”倾错误、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被“四人帮”颠倒了重大问题，才得以重新调查研究、拨乱反正。历史事实说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位置，由于大权在握，重任在肩，很容易忽视调查研究，从而导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贻误革命和建设。就拿人们关心的党风问题来说，不论是特殊化、走后门，还是官僚主义、瞎指挥，凡是在这方面搞得严重的党员干部，没有一个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那些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接触群众，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的党员干部，不可想象他们会搞特殊化，会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要做到实事求是，当然离不开调查研究，否则讲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新时期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员干部来说，除了加强理论学习以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搞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一环。

就秘书部门来说（这里泛指各级办公室）调查研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各级秘书部门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办事机构，它承担着除日常程序化工作、领导同志交办的工作以外，还承担着出主意、当参谋的重要职责，起着综合和枢纽作用。秘书部门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来说一般起着四种作用：一是参谋作用，二是助手作用，三是耳目作用（提供信息），四是协调作用。有的领导同志这样要求秘书部门：要为领导起眼睛作用，领导看不见的，你们要看见；起耳朵作用，领导听不见的，你们要听见，提供信息、迹象；还要起外脑的作用，经常提个醒，参谋参谋。由于秘书部门最贴近领导，起着上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的意见、办法和建议，可及时地、直接地向决策者反映，这是其他部门所不及的。因此，它的工作是否得力，对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否切合实际关系极大。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下，各级领导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更需要秘书部门接收和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经常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供领导择用。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舍此别无他途。陈云同志在1962年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

^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